

杀虎口

与中国北部边疆

◎ 王泽民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杀虎口

与中国北部边疆

◎王泽民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 / 王泽民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1115-075-9

I. 杀… II. 王… III. 关隘—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3098 号

书 名	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
著 者	王泽民
责任编辑	理 绥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0
字 数	527 千
版 期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1115-075-1/K·7
定 价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张正明

杀虎口,曾经作为中国北部边关要塞,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殊的历史文化。研究杀虎口文化,对于探讨中国北部边疆文化的渊源和内涵有着一定的意义。杀虎口文化,作为中国北部边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在向世人昭示着她特有的灿烂和卓越,并同草原文化、长城文化、古堡文化、晋商文化一样,为构筑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and 整体形象,发挥着互为依存、互为影响和互为促进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先进文化的今天,研究杀虎口文化的深厚内涵和杀虎口文化的特色,进而探讨中国北部边疆文化的时代精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多年来,史学界对杀虎口历史文化一直十分关注。专家学者们先后发表过不少文章,对杀虎口的历史文化进行过比较广泛的研讨,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由于各种原因,对杀虎口文化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有的问题还缺乏突破性的进展。近几年,中共山西省右玉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对杀虎口历史文化的发掘与研究,特别是2006年8月在右玉县召开的晋商与西口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对杀虎口历史文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由王泽民同志编著的《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对于杀虎口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并且对北部边疆史以及北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也有着很好的帮助。

杀虎口史是中国北部边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居住在我国大漠南北地区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存在着各有特征而又互相依存的两种经济、文化类型。

《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的作者努力用科学的论述和翔实的史料,探讨了北方各民族间的战争给各民族造成灾难性的损失,阐述了我国晋西北历史长廊中各民族在杀虎口这个险塞,与中原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频繁交往,以及彼此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深厚关系。这是作者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也是这本书独辟蹊径取得成功的渊源。

杀虎口史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难度较大的研究项目。这个地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互相兼并融合,兴衰嬗替,较为复杂。王泽民同志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查阅了大量有关杀虎口朱批奏折,又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书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以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搜集到大量有关杀虎口的文献资料,还数次实地考察杀虎口及周边地区历史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是本书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

杀虎口是明隆庆年间开设的互市市场之一。通贡互市,促进了边疆地区及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开拓了蒙汉之间 60 余年的和平局面。因此,杀虎口史的研究有助于对我国明清时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关税是古代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榷关是仅次于地丁钱粮、盐业而位居第三位的国家税课中商业税的主体。杀虎口关税收入的多少,不仅反映了当时晋西北地区商业发展的程度,也是当时国家机构与制度是否健全的表现之一,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导向。因此通过清代杀虎口税关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其在清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杀虎口作为连接草原和内地的关口,自然成为晋商旅蒙的主要渠道。有清一代长达三百年之久,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经过长期互通有无贸易往来,既推动了游牧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又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及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以微见著,杀虎口正是古代贸易活动的见证地。

杀虎口又是山西移民出口外的重要关口。从清代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近三个世纪。杀虎口作为“直北之要冲”自然成为移民运动的重要口岸。山西移民,尤其是晋西北的移民主力军便穿越此口,浩浩荡荡地奔赴土地肥沃的游牧地区,也有人把这一社会现象称为“走西口”。在“走西口”移民运动中,晋蒙两地在文化上出现的大碰撞、大交流,发生了明显的吸收融合的历史现象。

杀虎口站地垦务总局,是清政府放垦蒙地政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打破历来私租私垦的传统习惯,对台站旧有土地进行清理,重新划分了界址,同时也加强了对台站地的剥削,这样,有利于清政府实施统一的放垦政策,有利于清政府从中征收荒价,解决其财政危机。但是在实际放垦中,由于受到广大蒙汉人民的抵制,台站放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站兵的生计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生活痛苦不堪,激起了台站兵丁的强烈不满,台站驿务也日益废弛,直至瘫痪。

正如王思治先生所言,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离今天较近,要认识中国的国情,许多问题追本溯源,都与清代的社会存在与历史有关。而且,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必须从历史中去认识自己,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历史的启示、历史的教训、以及智慧和力量。

《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一书以翔实、丰富的资料,论述了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的密切关系。该书作者王泽民,在取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比较生动、科学地勾勒出了杀虎口的历史风貌及其特色。因此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书。是为序。

2007年1月10日

(张正明,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山西大学中国近代社会史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序

毕奥南

从历史人文地理角度来看,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处于农牧经济交汇地带,具有过渡地区的经济、人文特征。农业区与牧业区不仅有着经济类型的区别,而且因为从事两类经济生产的民族不同,从历史上讲,农牧经济区实际上又是不同的民族分布区,因而在地域文化上是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由王泽民先生编写的《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一书对这种地域独特性的历史演变有着比较充分的阐述,从而揭示了不同地域文化产生的历史过程,这对于人们理解晋蒙两地文化异同是重要的提示。

尽管三晋历史上曾经是中原文化的重镇,然而相对于中原文化核心,杀虎口乃至晋西北地区的地域文化无疑处于边缘地位。同样,与右玉县相邻的内蒙古地区也是游牧文化核心区向南过渡地带,其地域文化也具有边缘特征。

应该指出的是,以往囿于中原文化优越或农耕经济先进的传统观念,对于边缘文化所具有的新质,即文化交流带来文化变迁的结果,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忽略了这点,很难历史地体味文化发展的进程,又怎样理解当前因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新文化现象呢?文化发展需要交流、创新,文化的多元性正是交流、创新必不可少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展示中国的多元文化,特别是边疆文化,对于推动当前的文化建设乃至经济发展,有着出乎人们想象的独特作用。

我们讲边疆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能狭隘地将边疆文化理解为边境地区文化,或者是有边界线省区的文化。历史上多元文化分布区域并不等同今天的行政区,因此必须放大视野,历史地考察文化的发展脉络,才能真正把握区域文化的来源及发展趋向。本书展示的历史上杀虎口关隘军事作用,驿站、商道的交通功能,联系晋蒙经济的旅蒙商,走西口传播的移民文化等,关于古关隘、古长城、古墩台、古城堡、古石桥、古寺庙、古碑刻、古乐楼、古驿道,以及高亢悠扬的牧歌,令人感慨万千的“二人台”,……章章叙述,节节道来,如果用心去体会作者通过历史遗存传达的历史信息,相信会令许多关注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对杀虎口、右玉、晋西北,有一个新的认识。

(毕奥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序

刘建生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每次来到山西省右玉县，看到起伏的山峦上散布的烽火台和边墩，每每都会想起范仲淹的这首《秋思》。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右玉县北与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历朝以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杀虎口在明孝宗弘治朝以前叫杀胡堡，胡人是古代汉民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时过境迁，杀胡的威慑消散在边关的烟云中，但“杀胡”、“破虏”、“威远”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和三五里可见的关城旧堡，怎能不让人联想起脚下的这片土地过去曾经有过的“四面边声连角起”，“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时代？

阔别故乡数十载，去年8月应邀再次来到山西省右玉县，参加中共右玉县委、县政府组织的“西口论坛”。久未谋面，自然有许多故友新朋来我下榻的宾馆小聚。来往的人群中有一个朴实的中年人，年纪不大却饱经风霜，言谈中我发现他对右玉县的历史了若指掌，凡事均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细问之下，方知他叫王泽民，原在大同市从事北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来右玉县不过两年时间，这不由得使我这个多年从事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人肃然起敬。我也因此相信，右玉县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很快就能看到成效。

今年年初，王泽民同志的新作《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即将付梓，请我写序。以我看来，研究杀虎口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杀虎口是否就是清代的西口？由于史料阙如，现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杀虎口说、归化城说、河（曲）保（德）偏（关）说等，莫衷一是。我们的研究尽管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定最早的“西口”就是杀虎口，并以此给出了西口文化以杀虎口为核心的界定，但王泽民同志的新作中出于慎重和严谨，他并没有使用这一观点，而是以“杀虎口历史文化”为标题，避开了所有有关“西口”的争议，反映出他的治学态度和为人。

其次，杀虎口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中，军事文化的特征是最为显著的，尤其在清代以

前,这里是历代边关摩擦的主要战区。《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一书上溯秦汉时期的参合陁(仓鹤陁)、善无郡,下述明清时期的右卫玉林卫,并涉及周边大同等地,从地理沿革、兵事驻防、驿站邮递等角度逐一进行了论述,廓清了杀虎口一带历史变迁的基本情况。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系统研究了匈奴史、蒙古史的相关内容,从曾经南下与汉民族发生过战争的少数民族的视角,审视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里作为其南下的突破口。

其三,入清以后,杀虎口的军事地位随着国家政策的变迁逐渐弱化,国家财政职能、商贸、文化、移民、民族融合等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杀虎口税关在顺治七年开始设立,揭开了晋商旅蒙和汉民蒙古屯垦的序幕。作者较好的揭示了这一转化,并通过“调查归绥垦务报告书”、“鹿传霖、绍英查办贻案奏折”等史料,分析了杀虎口站地垦务局设立的历史背景、杀虎口台站地的丈放问题,以及杀虎口驿站地垦务等史实,并由此考察了清政府对蒙政策的变化过程。在杀虎口税关的研究上,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朱批奏折,从杀虎口政府管理的角度,系统考察了其筹建办法,各种规定、章程和条例,税关的预算决算问题,政府行文的移交,政令的颁布,谕飭文件,批牍等政府管理程序,为我们再现了清代杀虎口税关管理的全貌。

书中还以大盛魁为例,涉及了经由杀虎口入蒙的晋商的基本情况,并探讨了走西口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文化现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杀虎口在中国北疆历史上所起到的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得出了相对客观的结论。

毋庸讳言,本书存在着一些缺憾和不足,如理论体系不甚完善,分析工具单一等,但是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杀虎口区域文化现象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必将会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同时,对于进一步研究清代北路贸易的基本状况和与之相关的重大学术问题提供参考。多年远离家乡,难免会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幽思,细细品味王泽民同志的这部书,看到故土近年来的变化,让我忘却了“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愁绪。愿王泽民同志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有更大的发展,同时也祝愿故乡杀虎口这颗塞上明珠散发出更加炫目的光华。

(刘建生,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邓九刚

在呼和浩特的背面是莽莽苍苍的阴山山脉,俗称大青山。我经常登山作乐。每次登上大青山总喜欢站在某一座山峰上了望。向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盛夏的季节是绿草茵茵,野花烂漫的草原风光。这景色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当然是最为熟悉不过的。而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向南了望,我的目光越过山前的褶皱,俯览山下的景色。视野非常宽阔!天晴气朗的时候,能够看得很远,楼宇林立的市区、高耸的昭君墓,一条宽阔的快速道路向南延伸,景物逐渐模糊以至被一片云烟淹没。我知道那道路所指的前方是和林格尔,再往南便是杀虎口了!

在地理上她是敕勒川平原的延伸地。那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对我来说总是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因而也就充满着诱惑。我想象着她的过去想象着树林深处的那未曾看见过的景状。那山那水还有那依傍山势的长城、烽燧和著名的古堡。景色简直可以说是如诗如画!我知道这独特的景色成就了不少摄影名家名作。

杀虎口对我不仅充满诱惑而且还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感觉。她的诱惑和亲切更在于,这个地方是我笔下的人物经常活动的场所!我的描写清代商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中的大部分晋籍商人,就是通过这个关口走向闯世界的汉子们。南来北去,商人和走西口汉子们的足迹、英雄的战马的角质蹄掌的印迹千百次地叠擦在这条道路上。然而对于这块土地我却并不怎么了解,总害怕笔下弄出谬误,于是心下不免惶惑。

现在好了,有王泽民的新著《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可以为我排解许多疑难与困惑。王泽民的这部新著内容涉猎非常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贸、交通、地理、物产……,书中几乎都谈到了。有些论述是非常独到和新颖的,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很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比如作者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渊源及其发展的研究,其见解就相当深刻,也很是独到。对二人台文化和西口文化的研究也很深入。都能做到自成体系。对商贸关税的研究,就所收集的资料而言,也是甚为丰富。对秦直道、对杀虎口的历代居民,甚至生活在敕勒川的蒙古汗阿拉坦汗和三娘子,论及也很是到位。书中所收图片就更加丰富了!在我所看到的同类图书中,《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的图片是最为丰富的。从秦代有关的图片,到造型美妙的古寺庙、珍奇的宝宁寺水陆画、古戏台、元代驿路分布图、元

急递铺令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杀虎口历史文化包罗万象,这本书使我们获得一个了解杀虎口历史文化的捷径。由此我可以说王泽民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从中受益者恐怕不仅是我一个,相信王泽民的著作会受益于更多的人。说到这里我不免要感慨了,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对于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来说真是太需要了!

书中所谈到的“杀虎口”,在我看既是实指也是象征,或者更多的时候是象征。该书论述范围从地理上看远远超出了杀虎口的范围,从时间上看也远不止于明清两代。我还知道从呼和浩特到杀虎口再往南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南北大通道,早在三千年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就在这条通道上来往了。獯鬻、白羊、娄烦、鲜于,这些名字如今已经很是生疏了,但是曾经的历史活剧却是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再后来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北上、匈奴单于冒顿南下、鲜卑人入主中原、契丹人登上历史舞台、蒙古人统一中原,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直到明代的前期,杀虎口作为明朝与阿拉坦汗政权的交接地才发挥了边塞的作用。筑城建堡戒备森严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在战国时期的赵国、秦朝、两汉、北魏、东魏、北齐、隋朝、唐朝、辽代、金代、蒙元时代、清代,杀虎口两边在行政上完全是一统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内蒙古是中华历史的后院,那么杀虎口就该是后院通向前台的通道了。

王泽民在山西工作多年,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多方搜集资料,踏勘史迹,对与杀虎口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垦殖、税务、商贸、民族关系、宗教、民俗、艺术等诸多方面。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研究区域史的多个侧面,从而跳出了区域史研究较难避免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

我知道《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只是王泽民关于杀虎口历史文化的第一部论著,也是“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的第一部。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著作面世,我热切地期盼着。

(邓九刚,国家一级作家、晋商文化研究专家、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内蒙古作家》主编)

前言

赵向东 陈小洪

杀虎口,著名的九边“五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之一。明朝以京畿为中心,古北口为“北口”,喜峰口为“东口”,杀虎口为“西口”。晋陕蒙交界地区流行的一出反映清代生活的民间二人台小戏《走西口》,就是源于杀虎口之名。

杀虎口,自古就是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地带。早在汉代,汉族统治者就通过互市、朝贡等方式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往来于这一地区,历史上的茶马之路曾使杀虎口成为北方地区颇有名气的商埠。北魏王朝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视其为“劝课农耕”的畿内良田,明王朝视其为关系国家兴衰安危的险塞要地,清政府视其为发展边疆经济的交通要道。

1、“杀虎”的来历

“杀虎”源于“杀胡”;“杀虎口”源于“杀胡山”、“杀胡川”、“杀胡林”、“杀胡堡”。胡,原指北方游牧民族,早在秦汉时即已出现,南北朝后已普遍使用,诸多历史典籍均有记载,如:《史记》李将军列传里记载,“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新唐书》石雄列传记载,“会昌初,回鹘入寇,连年掠云、朔,牙五原塞下。诏雄为天德防御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刘沔屯云州。沔召雄谋曰:‘虏离散,当扫除久矣。国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径趋其牙,彼不及备,必弃公主走,我当迎主归。有如不捷,吾则死之。’雄曰:‘诺。’即选沙陀李国昌及契苾、拓拔杂虏三千骑,夜发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见鬲车十余乘,从者朱碧衣,谍者曰:‘公主帐也。’雄潜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无动。’雄穴城夜出,纵牛马鼓噪,直捣乌介帐。可汗大骇,单骑走,追至杀胡山,斩首万级,获马牛羊不赀,迎公主还。进丰州防御使。”

《新唐书》吐蕃列传记载,“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

《新五代史》契丹太祖阿保机太宗德光传记载,“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后汉以王继弘镇相州,得髑髅十数万枚,为大葬之。德光至临洺,见其

井邑荒残,笑谓晋人曰:‘致中国至此,皆燕王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栾城,得疾,卒于杀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肠胃,实之以盐,载而北,晋人谓之‘帝’焉。永康王兀欲立,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号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

《旧五代史》孔荭谷校薛居正五代史跋记载,“正文经官本改易也。如十卷‘犬羊猾夏’改‘边裔狡逞’,九十五卷‘腥膻’改‘契丹’,九十八卷‘虏母’改‘国母’,一百七卷‘契丹犯阙’改‘去汴’,一百二十卷‘东夷’改‘高丽’,一百三十七卷‘种落贱类’改‘生长边地’、‘乱华改‘辟地’、‘杀胡林’改‘杀虎林’之类,不可枚举。其尤关考证者,‘黑水靺鞨’下原作‘俗皆辫发,性凶悍’改为‘俗尚质朴,性强悍’,此皆馆臣避忌太过,奋笔妄改使然。”

杀虎口,因地处雁门之北,五原之冲,历代王朝在此屯兵驻守。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筑堡,名曰“杀胡堡”。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近关处另筑新堡一座,称“平集堡”,周2里,高下与旧堡相同,中建商店,内外交易。明王朝为严守此关,设守备一员,旧堡把总一员,新堡团总一员。新、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名,骑兵152名。清代,结束了内地同北部民族割据对峙局面,政权归于一统。“杀胡”遂改为“杀虎”。

2、杀虎口在中国古代北部边疆所起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是历代封建王朝着力经营的重要地区。秦汉时的北部边疆,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故秦汉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治理,主要是制定各种民族政策去处理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以保持边疆的安宁,同时采取一些适宜的行政管理办法以巩固边疆的统治。

《史记》始皇本纪载,秦初并天下,把全国统治地区划分为三十六郡,北部边疆或靠近北部边疆的地区有陇西、北堤、太原、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每郡置守、尉、监三个主要官员:郡守为一郡之长(他的助理称郡丞);郡尉为武职,掌军事、甲兵;郡监掌监察郡事。郡下设县,县令为一县之长。汉承秦制,基本上实行郡县制。

为了发展边疆经济,加强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促进,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曾大量从关中移民充实塞外,曾一次移民七十万口。并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雁门(今晋西北杀虎口以南10公里处)等郡,同时修筑了数条交通大道,杀虎口为雁门通往九原的咽喉要道。晋西北一带出现了很多城廓。据《汉书》地理志载:仅雁门一郡,即领县十四,有户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就这样,从中原北移的汉族人民与降汉的匈奴部落在晋西北一带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开始了晋西北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今杀虎口南10公里处,发现有许多汉代遗物,出土的有汉代“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陶壶、陶罐残片、五铢钱、半两钱,还有骨器、铁器等。1970年,民兵在杀虎口南10公里处的右卫城(西汉善无县,雁门郡治。东汉时雁门郡南徙,以善无为定襄郡治)西南角挖地洞,在距地面5—6米深处,挖出3个完整的陶壶。另外,在城内到处可以采集到裸露在地表的

汉代陶片。在古城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有大量的汉墓群和汉代遗物。在古城西北方 1.5 公里处有黑洲湾汉墓群,北面 1.5 公里处有红旗口汉墓群,西南方 2.5 公里处有南园汉墓群,正西方 1.5 公里处有西窑沟汉墓群,正南方 2 公里处有南梁汉墓群,东南方 5 公里处有黑流堡汉墓群等。这些汉墓群,现存有封土堆的墓冢 20 余座,封土堆最高 3—5 米,周长约 20 米左右。1990 年,南园汉墓清理出的汉代文物有陶壶、陶罐、陶狗、陶灶、陶井和一面“位至三公”铜镜等器物。此外,还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玳瑁器等,其中漆奁盒(国家一级文物)、鸭形熏炉(国家一级文物)被山西省博物馆收藏。这些出土文物,专家鉴定为西汉器物。另外,杀虎口地区除有大量的汉墓群外,在杀虎口以南 23 公里的善家堡村西北 500 米处,东西长约 1000 米,南北宽约 500 米的地方,还有匈奴的墓葬群。由于多年雨水冲刷,墓葬开始暴露,省、地、县三级考古工作者及时对此进行了清理。共清理出墓葬 23 座,出土文物 413 件(组)。在这些发掘清理的墓葬中,有少数墓葬较深,建于淡红色粘土层中,形状结构十分清楚,为典型的长方形土圪竖穴墓。绝大多数墓葬距地表很浅,墓圪土和墓室填土均为黄砂土。墓葬均无棺槨葬具。出土的器物有陶器、铜器、金器、铁器、骨角器、玉石器等,这些器物具有鲜明的汉匈文化特色。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曾经生活在杀虎口地区的汉匈两族劳动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

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双方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全面的接触关系,反映在空间上就是文化接触带的形成。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由于自身经济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内地汉族农耕的经济依附,都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不断南下,将文化接触带限制在农耕文化圈内,并大量扩散其文化因子,从而导致中原地区面貌的改变,最终促成农耕文化重心的南移。

西晋初期(公元 310 年),北方五胡十六国大乱,晋朝封鲜卑首领拓跋猗卢为代公,割到领以北地(代县勾注山以北)给拓跋猗卢。公元 314 年进封代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之后鲜卑内部混乱,互相残杀。直到公元 333 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统一诸部,又开始强盛起来,但不久被前秦苻坚击败,逃往漠北。公元 386 年拓跋什翼犍孙拓跋圭继代王位,改国号魏,他东攻西掠,南伐中原,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公元 398 年建都平城(今大同)。次年称帝(魏道武帝),此为中国历史上的北魏王朝。从此,鲜卑部又在晋西北地区定居。

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据《魏书》载:跋谓毗曰:“垒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甘,各相劝励”。燕风出使前秦时对苻坚说,魏“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云中川自东川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

这就说明,处于畿内地的杀虎口地区生产是大发展了,这一时期,杀虎口作为盛乐与平城之间的主要通道,不仅维系着北魏王朝的经济命脉,更主要的是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

人民的文化交流,这种状况大约维持了一百多年。

明代初期,为了彻底解除蒙古贵族对北方的压力,统一大漠南北,明王朝除派兵北征外,还在北方边境地区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以牵制蒙古诸部。据《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杀虎口地区,无论对已经退回草原大漠中的蒙古贵族的残余军事力量,还是对刚刚建立政权的明王朝来讲,均被视为双方实行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因此杀虎口地区自然成为九边重要军事防御基地之一。

隆庆年间,由于明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经济方面的联系。杀虎口,作为大同方面开辟的马市之一,成为联系蒙汉人民的坚强纽带。蒙汉人民和睦相处,马市也因此持续了数十年。

至清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大一统”局面的真正形成:清朝成功的民族政策,强大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了以往两大政权对峙的局面,长城从此失去了向北防御的意义,农耕与游牧被置于统一的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管辖之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杀虎口,作为“直北之要冲”,自然成为朝贡、商贸、移民的主要通道,清政府视其为发展边疆经济的重要口岸。

3、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走西口”现象

在古代中国,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流动人口是流民。由于流民的移动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偶发性,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目的地,而且流民多为在原居地没有财产、土地的贫民,与有组织、有目的的移民有很大的差异。流民并不等于移民,但流民无疑是移民的重要来源之一。

清代,在山东、河北农民移民关东地区的同时,山西的农民也纷纷经长城西段的杀虎口出关,徙居长城以北地区的蒙古草原,从事农耕和行商活动,当地人把这种移民现象称为“走西口”。

“走西口”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形成,既与清代山西人地关系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徙有关,也与清朝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移民政策的演变相联系。

“走西口”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晋西北地区的大同、左云、右玉、河曲、保德、朔县、平鲁等地。这些地区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沟壑纵横,土壤贫瘠、植被鲜少,降雨不足,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该地人口大量外徙。

内蒙古地区地广人稀,长期以来一直为单一的游牧经济所困,急需发展农业,以弥补单一游牧经济的不足。尤其是沿长城边外地区,土壤肥沃,光照充足,生长期长,非常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而口外蒙古地区人力有限,加上蒙古人自古以来驰骋马上,精于牧业,而不善于农耕,缺乏基本的农耕技术和农业人口,迫切需要从内地引进农业移民。

随着口内地区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大量流民移居口外的事实,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对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政策,允许内地灾民到内蒙古地区从事垦荒。

随着内蒙古地区的开禁,大量来自山西,陕西以及河北西部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纷纷移居口外地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开发蒙古大草原,对于中国北部边疆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史料

本书涉及杀虎口历史变迁、地理沿革、兵事驻防、驿站垦务、关税商贸、移民文化等内容,除运用一般的研究方法,如宏观分析法、微观分析法、抽象、描述等方法,还借用一些其他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文化地理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此外,还借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的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上官方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从二十五史到各种丛书、类书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数量多,保存完好。由于官方文献都纂修于当朝或下一朝,以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可信度较大,在这些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杀虎口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料。

私人著作也是研究杀虎口历史文化重要史料来源,如文集、诗集、日记、行记、游记、奏章、传记、碑刻、墓志铭、书信、序跋、题记等,这类文献对官方文献中一些缺漏的历史信息正好有纠误补漏之功,因此,这类文献对于研究杀虎口历史文化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宫中档案对研究杀虎口历史文化尤其有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国家清史编委会图书资料中心和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大量有关杀虎口税收情况的原始资料,这对于研究杀虎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对文献资料和非文献资料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应该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性。

5、研究杀虎口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

本书将“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作为研究选题,主要意义如下:

其一,杀虎口史是中国北部边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杀虎口密切相关的驿路、商队、商业点、贸易渠道是边疆开发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促进和推动今天中国北部边疆文化的建设,研究杀虎口的历史文化是很有意义的。鉴古可以知今,研究过去,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边疆地区的现实,有助于制定未来边疆开发的规划。

中国北部边疆辽阔广大,自然条件严酷,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资源丰富,各个地区的经济形式和发展水平很不相同,每种经济形式有自身的发展以及向更高形式前进的过程。这些发展变化受一定的自然环境的制约,研究这些发展变化以及各种经济形式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将给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提供生动丰富的例证。研究杀虎口史,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北部边疆开发史。这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团结,构

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二,清代的榷关制度是在明代榷关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一种较之明代更加完备的以征收内地关税为主的一种税关制度。清代榷关不仅数量上远远超过明代,而且在含义上也较明代钞关有所扩大。杀虎口作为清代重要税关之一,与清代的榷关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清代国家政权的历史,不能不研究清代的国家财政中的关税。

其三,人口迁移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人口的迁移实质上就是经济和迁移和文化的传播。杀虎口作为“走西口”主力军北迁蒙地的重要通道,与“西口文化”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其四,从杀虎口“吉盛堂”发展成为称雄塞外的巨商“大盛魁”,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草原与内地之间,杀虎口作为连接草原和内地的纽带,自然成为晋商旅蒙的主要渠道。有清一代长达三百年之久,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经过长期互通有无贸易往来,不仅带动了游牧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而且增进了蒙汉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依存,加深了民族间的情谊。

6、关于编写本书过程中的几点说明

根据上面我们对杀虎口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理解,组织编写了《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全书从内容看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部分,综合阐述杀虎口历史变迁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诸如农耕与游牧的文化渊源、杀虎口地理沿革、通贡互市、兵事驻防、驿站邮递、流民出边、关税商贸等;第二至五部分为分论部分,分别对杀虎口驿路、杀虎口站地垦务局、杀虎口税关沿革及税收管理、杀虎口“吉盛堂”与归化城“大盛魁”、“走西口”及走西口文化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台湾学者吴美凤撰写的《从台北故宫所藏清代档案看“远在边疆”的杀虎口》一文,对杀虎口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颇有参考价值,故征得作者同意,也收入本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曾得到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的关怀与支持,尤其是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同志,对本书的编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里一并致以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本书在编写内容上会有许多不足,敬祈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赵向东,中共朔州市委常委、右玉县委书记;陈小洪,山西省右玉县人民政府县长)